



近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浅论

——从“争教不争国”到“兴教救国”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102-07

●陈红梅

[摘要]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内生的族群之一,以其伊斯兰教信仰为重要表征。历史上回族与各王朝政权之间基本呈正面的互动关系,有着积极的国家认同意识和表现。清朝中叶以后,西北西南回族屡受政府打击,其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争教不争国”的政治态度。民国建立后,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回族紧跟时代步伐,在复兴族群的同时以主人翁精神努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建立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意识,“兴教救国”即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 近代回族;政治意识;国家认同;争教不争国;兴教救国

[中图分类号] K281/288.13 [文献标识码] A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民族,总是能够紧跟时代和主流社会发展的脚步,调整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回族就是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寻找自己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道路的民族。

“争教不争国”与“兴教救国”是近代回族社会在看待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时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的表述。“教”在这里既指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也用来表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在这里也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皇权统治下的“家国天下”及政权,二是指近代意义上的以领土、国民、政权为主要构成因素的“民族国家”。从字面上看,“争教不争国”表现出对宗教的积极态度和对国家的消极态度,“兴教救国”主张对国家与宗教均持积极态度,显示出一种双重的认同与责任意识。结合近代回族的历史,这两种态度实际上折射出了

[基金项目] 本文是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中国回族的双重认同”(09NXBMZ04)的阶段性成果。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0年第3期(总第66期)

2010.No.3(Total No.66)



近现代回族政治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发展变化。那么,这两种政治态度分别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争教不争国”到“兴教救国”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这种变化对回族社会又意味着什么?本文试图就以上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回族的形成过程与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回族的先民并非中国本土居民,而是由唐宋时期前来中国经商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和元初被蒙古军队从中亚、西亚等信仰伊斯兰教地区劫掠而来的兵士、工匠以及明代归附的西域人等所构成。他们在中国长期居住经商、耕种土地、娶妻生子,经过世代的生息繁衍,他们的后裔已在各个方面融入了中国社会。在元朝,他们被接纳为“回回户”,正式成为中国的编民。“从外部看,回族不是中国的周边民族,而是形成于中原王朝内部。”^①就政治层面而言,回族在中国境内形成过程中,既没有属于自己的世居领地,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民族性政权组织,这样,回族作为中国内生的民族形成后对代表国家权力的封建王朝则较容易认同和接受。所以在元、明时期回回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回回人在政治上很自然地被纳入到王朝各地方政权的管理体系当中,并对中央王朝建立起较为充分的政治认同。

清代前期,回回受到的信任及优渥待遇虽不可与元代同日而语,但总体来说,统治者尚能对回回以怀柔羁縻为主,即便有部分官员、读书人抱持传统“夷夏之辨”观念,不时对回回作出各种非议和责难,作为最高统治者,康熙、乾隆等也均能够以清醒的认识、宽容的态度对待回回问题。这无疑有助于回回共同体国家认同感的加强。同时,回回民族在明清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即包括回回人已经在居住、服饰、语言等很多方面与各地汉族没有明显区别,回回人在文化上自觉接纳儒家文化,在政治上接受皇权体制下各级政权的管理。

总之,从元明至清前期,回回共同体与国家政权之间基本呈正面、良性的互动关系,回回的政治态度亦呈现出积极的面貌。

二

何谓“争教不争国”?从民国时期的一些批评中,大概可以看出以下两层意思:第一,回族人将回族先民迁来之地追溯为自己的祖国,自视为外人,而感觉与国事无关。“吾教之人,大部皆怀争教不争国之观念,以为吾乃西域回教徒,仅当爱护吾之宗教而已,彼外教之中国,与吾人何干。”^②第二,对政治“避而远之”,“认为国家的政事,自有人管理,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甚至对于政治二字,不愿谈及,以避嫌疑。”^③“我们回教自遭满清摧残之后,有不敢过问政治的趋势,所以有些回胞抱‘争教不争国’的观念,这是错误的见解。”^④

“争教不争国”究系何时何人提出,已无法具体考证。但总的看来,“争教不争国”在清末民国时期所办新式报刊中屡遭评议,可知该提法在当时尚在流行。“争教不争国”所反映的政治态度与回回人在元朝的政治地位并不吻合,而明朝,回族与伊斯兰教在中国正处在稳定发展期,似乎不必有“争教”之必要,回回与统治者也没有形成对立关系,似乎也不需要以“不争国”相表白。综合以上分析,“争教不争国”当是在回族生存环境恶劣,与统治王朝关系紧张的清中后期开始出现的。

乾隆中期后,清王朝已从盛世逐渐走向衰落,各种危机、矛盾聚积,中央集权已被日益败坏的吏治所侵

① 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16.

② 马立身.爱国与爱教[J].月华,第2卷第3期(1930年).

③ 馨吾.回教徒与政治[J].月华,第2卷第12期.

④ 白崇禧.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J].回教大众,创刊号(1938年).

蚀,而清王朝也开始由开国初的宏阔气势走向封闭保守。此时,回族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自明末清初,西北地区回族中出现了伊斯兰教新的教派,至乾隆初年,不同的教派门宦之间由于认识的差异和对教众的争夺,开始屡屡发生争斗。清地方官员在处理这类宗教问题时,往往不能深入了解问题的根源,从而找出长远的解决之道,他们或者敷衍塞责,或者简单主观,因而最终酿成乾隆四十六年(1871年)的苏四十三起义。这次起义被认为“开始了(清朝)对伊斯兰教政策的一个新的时期”,还“是清代社会由极盛逐步走向衰败的一个反映”。^①

自苏四十三起义之后,咸丰同治年间西南西北回族为求生存曾发动大规模抗清起义,但失败的结果使回族社会遭受到更大的打击,西南西北原回族聚居区人口锐减,政府善后安置使部分回族被迫迁居生产生活条件更为恶劣的区域。另外,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清中后期,各级地方政府对回族的防范日趋严密,导致回族尤其是西北回族社会倾向更加内敛,更多关注生计,并且在宗教信仰的精神世界中寻求人生的寄托和心灵安慰。^②

“争教不争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被回族社会提了出来,并逐渐成为回族尤其是回族底层社会的普遍认识。

对于回族社会而言,“争教不争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争教不争国”表达了回族民众坚定的信仰。“我教民有一句老话,就是‘争教不争国’,如果因种族宗教而战争,便杀人流血的奋斗,身家性命,漠不关心。”^③因伊斯兰教是回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在回族形成的“自在”阶段,相当部分的回族民众是以宗教作为自己的认同基础,又由于回族“内嵌”于中国社会中,必然会因其宗教信仰异于周围汉族的宗教信仰而产生文化压力,“争教”可以说是对所遭受的文化压力的一种应对。在晚清回族社会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回族社会更是通过强调对信仰的坚定,以凝聚民族精神,表现出回回民族上升的民族意识。

其次,“争教不争国”反映了近代回族淡薄的国家意识。在君主专制时代,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建立之前,“国家”概念往往与“王朝”、“君主”是同一的,而作为臣民,只需把对国家的忠诚投射到“君主”与“王朝”身上。在古代中国,“忠君”与“报国”的意义无本质区别,至于超越具体王朝的抽象国家观念在20世纪前的中国,还只能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专利。对于大多数回族民众来说,既然国家就是君王,君王亦即国家,那么,某个君主及其王朝对回族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回族对国家的态度。元王朝优待回回人,则回回人效忠国家(元王朝),清王朝排抑回族,则回族疏离国家。

再次,“争教不争国”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回族政治态度的消极。面对长期以来汉族知识分子基于传统夷夏观念的无端猜测以及几次回民起义给清朝各级统治者造成的反叛印象,回族社会用“不争国”庶几可以消减统治者的猜忌态度,为回族争取较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在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出版的回族第一份近代刊物《醒回篇》中即有相关议论:“夫神州大陆,中原杂处,惟满、汉久分门户。所谓回者,厕列其间,相安无事。闻之父老,有所谓争教不争国者,殆即回回入中国传教之宗旨也耶。近人不察,每以回民目之,且有谓为回族者,则是满汉之外,又树一民族之敌。”^④无独有偶,回族民间另一个广为流传的历史记忆似可印证“争教不争国”的此层含义: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被杀害后,甘肃和今宁夏西海固地区将马化龙生前曾对教众说的一些带有预言性的言语编纂成诗,口头流传于民间,其中一首诗有这样的内容:“皆道回回爱造反,历代立帝岂回皇?”^⑤这两句诗被一些学者引用,认为反映了回民起义无意于政治权力,实属重压之下的无奈之举的实情。

上述的国家意识和政治态度阻碍了回族社会与外界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回族社会以宗教为寄托,呈现自我封闭的趋势,回族子弟不愿学习宗教之外的文化知识,造成回族社会整体的衰落。回族社会的自

① 李兴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回教)的政策[A].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8.

② 张承志.心灵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③ 薛文波.回教两个重大的问题[J].月华,第2卷第9期.

④ 黄镇磐.论回民[J].王希隆点校.醒回篇[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33.

⑤ 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418.



我封闭和文化落后,其影响所及不仅在回族自身,民国回族贤达对此有深刻认识:“回族文化的静止,国家意识的薄弱,对于回族本身,多少成功了不和汉族同化而使本身加强特性的结果。这种现象,消极方面减削中华民族整个的力量,另一方面促成回汉的反感,影响所及,真不是楮墨所能形容的了。”^①

三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觉醒,许多相关的西方概念、理论纷纷传入中国,包括近代国家理念、民族概念、国民概念、民主共和观念等等。这些新知为回族的知识精英思考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回族在国家中的地位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回族社会对一些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如关于回族历史的问题、回族回教的关系问题等。在当时见诸报端的言论中,回族社会所表现出的对宗教的认知,对国家的态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主张,更是激起回族社会的广泛响应,“民国成立,五族一家”,“民国开元,国体更新,五族平等,一视同仁”等文字出现在许多回族报章中,而“爱国爱教”、“兴教救国”、“保国保教”则成为民国期间回族社会最为强烈的呼声。

在“爱国爱教”、“兴教救国”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清晰观察到回族社会对于国家的认识,对于民族自身发展的新思考,与家国一体、忠君爱国相一致的时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认知、态度及行动三方面加以考察。

(一)对民族宗教与国家关系的认知。“民族”概念被中国人接受,一般认为是在1895年后,章炳麟、梁启超都是较早并较多使用“民族”一词的著名学人。目前所见回族内部对“民族”一词最早使用的,大概是《醒回篇》,如黄镇磐《论回民》一文言:“尝见时人论政,辄以汉、满、蒙、回、藏、苗相提并称,俨然以六大民族标榜之。”赵钟奇《中国回教之来历》中说:“然则散处中国各省之回教,非单纯之民族,乃合成之民族。若以近世文明各国之法律例之,直不成其为民族,不过教徒而已。”^②

从清末到民国,特别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回族对历史上自身所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如“回族为中国五大民族之一,可以称得起是一个伟大民族。”^③“由唐而宋而元明,回族中之名臣达士,代不乏人,忠贞护国,千年一辙。”^④这表现出对民族的认同与自信,而这种自信,又是与认识到回族于国家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五族之中,其所以能负巨艰,任重责者,只我回汉二族耳。”^⑤一种在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现实境遇下,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跃然纸上。

此时,回族对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首先强调的是“回族为中国组成部分”的认识,对于回族来自域外的观念则极力纠正:“抑知我教与中国之关系,非留居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者乎,胡漫不加察,而自称天方曰吾祖国、宗国,噫!吾教若果皆天方人也,是与旅居于中国者无以异矣。自弃自外,其颠孰甚!愿同人抱本寻源,勿人云亦云,而自失其固有之国籍,以退居于无国民责任之列也可。”^⑥“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⑦“我中华回民皆中国之国民,生于斯、息于斯,与国家有绝对不可分离之关系。”^⑧

其次,强调的是民族宗教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认识。有了回族为中国一部分的认识,结合历史上回族

① 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节录)[A].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034.

② 王希隆点校.醒回篇[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33、45.

③ 薛文波.中国回族的地位和本身应有的认识[J].月华,第4卷第10、11、12期合刊(1932年).

④ 青海回教促进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J].月华,第4卷第10、11、12期合刊.

⑤ 薛文波.回族救国[J].月华,第4卷第22、23、24期合刊.

⑥ 赵钟奇.中国回教之来历[A].王希隆点校.醒回篇[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45.

⑦ 白崇禧.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J].回教大众,创刊号.

⑧ 中国回教民众拥护抗战[N].大公报,1937-12-16.

与中国各民族共命运的事实,回族对自身命运依赖于国家的认识尤为深刻:“种族之区别,不过内部自为畛域,其对于外界,毫无效力可言。例如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一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而恶得曰:‘他种族之兴亡,与我无涉也。’”^①“民族如此,宗教自不例外:‘吾人之宗教信仰,附丽于国家与全民族,如果国家民族不复存在,虽有完美的宗教信仰,又将何所寄托呢?’”^②“在现在政治制度之下,人类最大的法团还是国家,一切事物,都在国家范畴之内而活动,国家的福利,就是国家的一切的大或小的单位的福利,国家的危害也就是国家内的一切大或小的单位的危害。宗教是国家单位之一,当然它的福利和危害,是看国家的形势为转移。国家强盛,则国家内建设无人阻挠,国内秩序无人破坏,宗教也就可以在这优良环境下,逐步的兴盛;国家灭亡,国民都成了亡国奴隶,决没有某一部分民众或某个单位,可以安全的道理,纵有,也是一时的利用,而不是正常的状态。所以‘国之不存,教将安附?’”^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言论中,我们看到回族在看待自身与国家的关系时开始强调其公民身份,如《醒回篇》中保廷梁《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一文将国家视为一有机体,而视个人为组成有机体的一分子:“国家如个人也。组织个人以多数之分子,夫而后成其为人,组织国家亦以多数之分子,夫而后名之为国。组织个人之分子,无论其为筋肉,为皮骨,为心脏,为食管,为气管,为血行系,为神经系统,其所以为组织人身之分子则一。国家之分子,亦无论其职业之为吏、为军、为商、为士、为工、为农,与夫其种族之或满、或汉、或回、或藏、或蒙,而其所以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一。”《月华》第2卷第3期所载马立身《爱国与爱教》一文也称:“国家藉人民以成立,人民赖国家以保存,休戚相关,互为维系,是故国兴民之荣,国亡民之辱也。”这种认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随着多民族国家的日益普遍,在现代的国家认同模式中,“公民意识”或者“国民意识”更多地成为多民族国家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回族对于国家及其组成的新认识,无疑是对传统中国“忠君爱国”模式的否认,体现了回族与时代相符的进步的国家观。

(二)对民族宗教与国家关系的态度。态度基于认知的水平。在前述认知的指引下,回族社会在清末民国时期对待民族宗教与国家关系的态度明显呈积极状态。

回族知识阶层开始广泛论说回族对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在中国的清真教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能把国家维持的强盛了,教门一定能跟着发达。”“因此,既是中国人,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所以,“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④“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所以要一方面发扬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⑤艾沙在《中国回教与抗战》一文中用父子关系比喻回族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地国父孙逸仙博士曾经遗给他的五个儿子许多光荣伟大的遗产,因此每个儿子都负着保护和相传那遗产的责任。中国同胞对于负责方面,不敢后人,所以自然而然地执行他们地任务。”^⑥

对于回族社会长期存在的“争教不争国”以及不参与政治等消极观念,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馨吾《回教徒与政治》一文指出:“民国成立,五族一家,既没有种族的分别,也没有宗教的分别,凡是中国籍的人,就是中国的主人,中国强则为强国民,中国亡则为亡国奴,平等一律,毫无轩轻。不要以为政治不是我们过问的,不知政治就不知有国家。”文章还特别强调每个穆斯林作为“国民”的责任:“大多数的教友都要负起国民

① 保廷梁.劝同人负兴教育之责任说[J].王希隆点校.醒回篇[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26.

② 唐柯三.今日之回教组织[J].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1期.

③ 王梦扬.救国与兴教[J].回教论坛半月刊,第2卷第10期.

④ 参见丁竹园.正宗爱国报[N].1912-03-03,1912-12-14.

⑤ 白崇禧.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J].回教大众,创刊号.

⑥ 艾沙.中国回教与抗战[J].回教论坛,第3卷第5期.



的职责,因为欲使中国兴盛,我们享受安全的生活,不受那帝国主义的欺侮,须有贤能的政治家,组织稳固的政府固不待言,尤必须全国的群众在水平线上,认清目标一致努力奋斗,才能达到完全的成功。几千万众的回教徒,要是竟走落伍之路,不能尽国民的职责,则国家的力量就要减少一部,‘金瓯有缺’,影响于国家的关系是很大的。”^①

与此同时,“兴教救国”成为上述积极的国家认同态度的最好表达,尤其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家面临危难之时,“兴教救国”更成为回族发出的最多的声音。

抗战时期的回族社团之一伊斯兰教学友会在其发表的抗日宣言中宣称:“教胞乎,国若不存,身危随之,身既危殆,教胡能完!至圣曰:‘爱国属于信德。’换言之,不爱国即有损于信德也。吾国教胞占全国人数六分之一,历代以忠勇卫国见称于世,吾教胞亟宜保持历史上之美德,更发扬而光大之。当此国运颓衰之时,吾六千万精明勇健教胞,宜如何蹶然奋起,以期挽回颓势,而跻国家于复兴,匪惟国家之幸,亦即宗教之幸,进一步言之,亦即人道正义之幸也。本会忝为教中智识阶级,爱国爱教,不敢后人,敢正襟以告教胞及全国民众曰:吾人不辰,生此隍圻时局之中,精神物质,并受桎梏,舍自救外,别无他策!”^②这应该说反映了回族知识界的共同认识。

宗教界的态度同样鲜明且坚定。王静斋写道:“一旦有人向你问及应如何对国家,则曰:国家为吾辈国民同胞生死之地,食毛践土之区。吾人为巩固国本计,自当相亲相爱,国家可藉此亲爱,达到最高之地步。即可保旧有之势力,且得增加若许之尊严。国民最应尽之义务,首推生命与财产。为国输将,挺身冒险,皆利国利家之道。遇难苟且,贪生畏死者,能得自由之生存乎?人人不免一死,为国捐躯者,其人虽灭,而其名永存于世也。”^③

(三)兴教救国与回族社会的行动。回族社会在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国时期面临重大政治抉择和国家危难,每每能做出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行动,应该说是基于上述认识和态度的选择,使“知”与“行”达到统一的结果。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共和民主国家,开启了中国的新纪元。然而,当时国内的政局是风云诡谲,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就民族问题而言,由于清王朝曾以联合蒙、藏以牵制汉人为其统治手段,所以民国建立,各民族顺利实现对新政权的认可,当其时并非顺理成章。梁启超1911年在《新中国建设之问题》一文中对此曾有过很深的担忧:“蒙、回、藏之内附,前此由于服本朝之生威,今兹仍训于本朝之名公,皇统既易,是否尚能维系,若其不能,中国有无危险?”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在西北,就有满洲贵族所创宗社党的成员、陕西巡抚升允“谗言共和政体不适吾国人情,且有害于回民教典”,而“西北人民忠实性成,脑筋简单,且信仰素笃,因而受其愚惑,为之驱使,以为荣幸。”时任甘肃提督的回族地方军事实力派人物马安良在升允指使下领兵“勤王”,镇压陕西起义。在关键时刻,知名全国的王浩然阿訇在北京给马安良拟发了一份电报,电文称:“翰儒教兄勋鉴: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弟以依玛尼(信仰)为证,誓诸真宰:共和政体,决无妨害吾教,请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兄执西北军机牛耳,处此激流激荡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勋、民族英雄、宗教伟人,只一反掌耳。时机难再,幸勿失之!敬希急速停进,通电诋赞共和,福被群生,名垂永世,岂只国家之幸,是亦回教之福也。”“一电相传,而西北安如磐石矣。”^④当然,马安良的撤兵与否绝非一纸电文所能左右,而是由当时南北和谈告成,清帝宣布退位的大趋势所决定的,但在此过程中,王浩然阿訇的行动选择和着眼于国家、共和、民族、宗教利益相劝的言词,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回族宗教上层有识之士在历史关节点的关注目标和选择方向。

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回族社会更是几乎全民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行动中,既有各种回族抗日武装走上前

① 馨吾.回教徒与政治[J].月华,第2卷第12期.

② 伊斯兰教学友会抗日宣言[J].月华,第3卷第35期.

③ 王静斋.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J].月华,第2卷第3期.

④ 马善亭.王浩然阿衡轶事[A].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616.

线,又有各类回族社团从事抗日的宣传、动员、组织、服务等各项工作,既有军政界回族要人参与国家的军机筹划,又有德高望重的阿訇根据教义向教众阐释“爱国爱教”之义,宁夏虎嵩山大阿訇还写出抗日祈祷词交各清真寺诵念。“教育救国”、“宗教救国”等提法时常出现于报章中。抗战时期回族社会的表现称得上尽心竭力,可圈可点。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说是清末民国以来回族的国家认同不断强化,回族的政治意识不断上升的结果。^①

四

从上述回族在近代对“争教不争国”和“兴教救国”两个不同观念的取舍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回族社会近代国家观念和政治意识的变迁。这种变迁首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方面,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回族知识阶层眼界大开,拥有了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民国的建立,政治领袖对“五族共和”的界说,打破了清中期以后回族遭受打击,消沉衰落的命运,回族社会对于新社会的憧憬,唤起了原本蕴含在民族血液中的责任意识与政治热情。其次,我们看到,近代回族的国家认同所体现的是与国内各民族相一致的共性追求,回族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不表现在对其民族利益特殊性的追求上,回族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实现其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这种在政治认同方面的共性追求,并不意味着回族民族独特性的丧失。就近代回族而言,在政治上对国家高度认同的同时,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也得到强化,两者并行不悖,形成近代回族的双重认同局面。

就国家而言,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是多民族国家得以稳固存在的基础和保障,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尤其如此。对于回族而言,其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伴随着其对国家认同的取得,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社会的政治取向始终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因而很大程度上赢得了政府的认可,为回族实现其近代化转型和民族振兴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这种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同步同向发展的经历,使回族社会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追寻着民族的振兴,又将本民族的振兴转化为国家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强化着回族的国家认同。所以,近代回族国家认同的演变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即国家政权对回族政治认同、对其权益保障,与回族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及维护是相对应的。近代回族从“争教不争国”到“爱国爱教”的转变似乎可以印证这一点。(本文英文摘要见 P.112)

[收稿日期]2010-06-11

[作者简介]陈红梅,女,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博士生。银川 750021

(上接第 117 页)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xplanatory Paradigms for Society between E. Durkheim and M. Weber

Liu Rong Li Qingzhen

Abstract: Being regarded respectively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tructural-functional paradigm and interpreting paradigm in sociology, Emile Durkheim and Max Weber's differences in methodology are emphasized in previous studies, while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thought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paradigms of E Durkheim and M Weber's explanations for society are interlinked for both of them belong to the same category of the subject of "sociology".

Key words: Emile Durkheim ;Max Weber ;society ;explanatory paradigms

^① 关于回族各界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学界有较为系统的阐述,此不赘述。参见李伟《抗日战争中的回族》,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瑞海《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共命运、心连心的传统代代相传。

三要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民族团结进步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务必切实抓好。胡锦涛同志在国务院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继续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大力增强我国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要大力促进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不断形成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强大力量。上述讲话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深刻理解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认真贯彻落实,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奠定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收稿日期]2010-06-25

[作者简介]毛乐燕(1978~)女,民族出版社编辑,金融经济师。北京 100013

(上接第 108 页)

On Political Awareness of the Hui Ethnic Group and its National Identity in Modern Times ——from “fighting for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but not for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untry” to “rejuvenating religious belief and saving the nation”

Chen Hongmei

Abstract: The Hui ethnic group is one of the ethnic groups born in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with Islamic belief as its most important featur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Hui ethnic group basically maintained positive interactions with regimes of different dynasties; therefore, it has active national identity awareness and performances. However, since the middle par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Hui people living in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China had been given blows by the feudal governments, hence came the negative political attitude “fighting for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but not for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untry”. After the found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er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the Hui ethnic group kept its pace with times. In rejuvenating its ethnic group, the Hui people made great effort to promote the revival and prosperity of Chinese nation, establishing high awareness of national identity. “Rejuvenating religious belief and saving the nation” are representations of this awareness.

Key words: the Hui ethnic group in modern times; political awareness; national identity; “fighting for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but not for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untry”; “rejuvenating religious belief and saving the nation”